



复旦大讲堂

周桂发 周筱贇 编

第一辑

University Academic Forum

Fudan

- | | | | |
|-----|-----------------|-----|-----------------|
| 陈思和 |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 俞吾金 | 走出自我的困境 |
| 王晓明 | 寻找上海 | 谢遐龄 |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析 |
| 李欧梵 | 晚清小说与中国现代性想像的确立 | 姜义华 | 人的尊严：启蒙的重新定位 |
| 葛剑雄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 石磊 | 名誉、货币与竞争 |
| 朱维铮 | 清末民初的学与政 | 奚恺元 | 经济学的新方向 |
| 郑逸麟 | 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回顾 | 高耀洁 | 中国艾滋病传播现状与忧思 |
| 马 |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 许纪霖 | 从非典反思国家、社群和公民意识 |

复旦大学出版社



邹逸麟



俞吾金



资中筠



谢逸生

Z4
Z760



复旦讲堂

周桂发 周筱赟 编

第一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大讲台. 第一辑/周桂发,周筱贇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5

ISBN 7-309-03981-5

I. 复… II. ①周…②周…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自然科学-文集 IV. Z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652 号

复旦大讲台(第一辑)

周桂发 周筱贇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丹

装帧设计 孙曙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46 千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 000

书号 ISBN 7-309-03981-5/Z·42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本书是《复旦大讲堂》书系的第一辑，汇集了各领域第一流、且具公众号召力的15位知名学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依照内容分为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经济、防疫六编，每编大体按时间顺序收录演讲二至三篇，强调思想深度与当下性意义，拒绝浮躁与煽情，以彰显复旦这座百年学府的深厚文化底蕴。

文学编集中反映了现当代文学的前沿研究成果。陈思和教授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宣传、道德教化等非文学功能，而1990年代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的“无名时代”，文学摆脱了统一的宏大主题，世纪之交的当代作家，不再沉溺于文学的想像与虚构，而是重回现实生活，关注最底层民众的平凡命运，同时更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王晓明教授则通过对王安忆小说的细致分析，同样指明了中国文学的这一重要转向。那个充溢着风花雪月的老上海故事模式，只是媒体、新富、白领等共谋炮制的神话，而从王安忆笔下我们读到的便是与之迥乎不同的另一类老上海故事。李欧梵教授高度评价了以往被冠之以“格调低俗”恶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之嚆矢应自“五四”前推至晚清。晚清小说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为“五四”新文化奠定了基础，更为当时的中国奠定了初步的现代性想像。

历史编是三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治史心得。葛剑雄教授以自己读书与行路的亲身体验，不仅授予我们学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在为人之道上亦有诸多启迪。他对学术泛政治化、藉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批判，更是秉承了其一贯求真求实的精神。朱维铮教授以高屋建瓴之势，理清了清末民初20年间学与政的发展脉络，其纵横捭阖的演讲气势，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邹逸麟教授则以缜密的逻辑，确凿的史实，分析了历史时期

中国环境变迁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无不以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为代价。当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正是历史长期积淀而成。我们一直强调的“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必须纠正。

哲学编的第一篇是享有全球声誉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教授在复旦的演讲,哈贝马斯分析了欧洲民族国家面对全球化压力之下存在的四种回应方式,他主张积极进取的第三条道路,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又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质。哈氏的观点,对于同样面临全球化压力的当代中国,也有不小的借鉴意义。俞吾金教授讨论人类自我困境种种表现以及摆脱方式,作为获得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的复旦大学代表队的领队,他的演讲却全然没有辩论式的咄咄逼人,平易近人而不失智慧。

社会编的三篇演讲,反映当代社会的理论热点问题。资中筠研究员从人口、环境、教育、文化诸方面论证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存在的先天不足,对当下学界流行的中国现代化“后发优势”理论提出了有力的反证。资中筠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现代化史了然于胸,同时于中国传统文化亦有深入研究,她的这一意见应当引起思想界重视。谢遐龄教授用社会学理论深入解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成因,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形成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无条件尊重他人权利”的传统,以致长期无法建立公民意识,舍此则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皆成空谈。姜义华教授以“人的尊严”为切入点,探讨了启蒙在中国由高涨至失落,再到复兴的过程,并指出几为学界视为定论的“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并不确切,而是毛泽东本人一度批判却又最终接受的民粹主义思想起了关键作用。同时,姜教授预言 21 世纪绝非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宣称的中华文化的世纪,而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世纪。他以学者的良知,呼吁给予农民选择职业、自由迁徙的权利。

经济编中,石磊教授澄清了对名誉、货币与竞争的诸多似是而非的理解。名誉并非虚荣,而可以给拥有者带来实际价值;货币本身并不包含某种价值偏好,而在于以何种态度对待;竞争只有利用人自身的趋利动机才能生效,但竞争是迄今能找到的将道德、伦理、法律、市场规则统一起来的最好机制。奚恺元教授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相符,人的决策还受非理性因素制约。他通过实验证明心理对经济行为有

着巨大影响,人的幸福程度取决于诸多与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因而单纯用 GDP 衡量社会发展并不妥当。

最后的防疫编,收入的两篇演讲内容涉及引起当前高层领导和普通公众广泛关注的艾滋病与非典疫情。78岁高龄的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医生,不顾一身病躯,多次深入艾滋病疫区,宣传防艾知识,救助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她崇高的人格与非凡的勇气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尊重和赞扬。在2001年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典礼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未能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高医生的复旦演讲,围绕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和艾滋孤儿的悲惨境遇展开,她人性的光芒照亮了在场每一个复旦学子的心灵深处。许纪霖教授针对2003年春天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非典危机,从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诸方面做了深刻的反思。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相比较,中国公众一直未能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在危机时刻,民族国家利益一旦与家族、地方利益相悖,便被旁置于侧,非典时期各地对北京人普遍的歧视便是明证。同时,百万学生、民工逃离北京,凸显了作为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社群在缓解危机中的缺席,这与“9·11”后的美国恰成鲜明对比。非典是一场危机,但也为中国重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摒弃全能主义时代的行政控制、革命动员模式提供了历史契机。

以上分编未必严谨,只是为了便于读者有针对性的阅读而已。在这个充斥着浮躁与功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为启蒙留一点空间,是否亦是一种奢望呢?

编 者

2004年4月

目 录

陈思和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1

王晓明
寻找上海：老上海
故事与王安忆的小说转向

17

李欧梵
晚清小说
与中国现代性想像的确立

29

葛剑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9

朱维铮
清末民初的学与政

59

邹逸麟
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回顾

71

哈贝马斯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85

俞吾金
走出自我的困境
99

资中筠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
117

谢遐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析
133

姜义华
人的尊严：启蒙的重新定位
149

石磊
名誉、货币与竞争
165

奚恺元
经济学的新方向：
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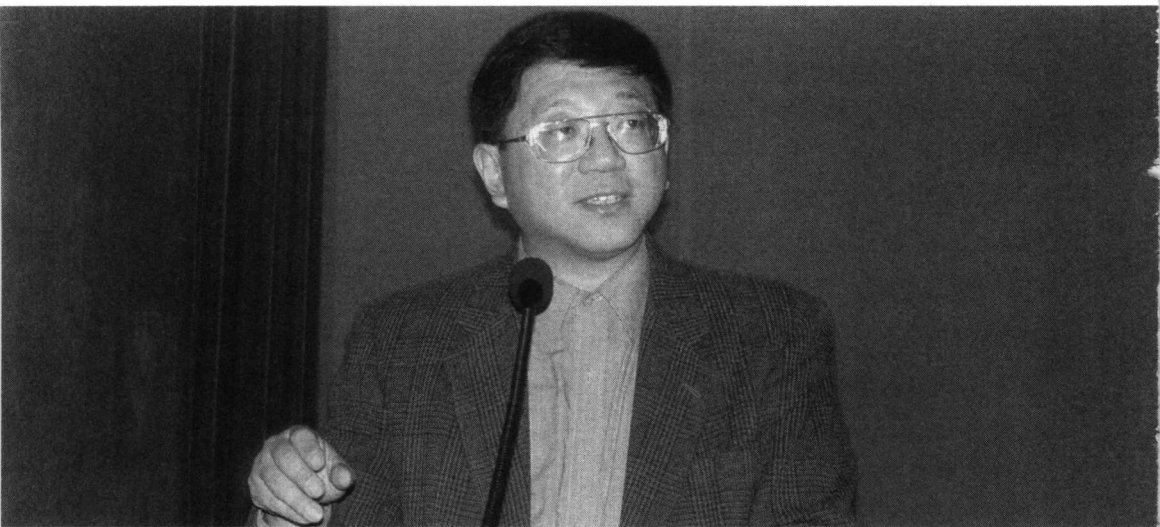
高耀洁
中国艾滋病传播现状与忧思
193

许纪霖
从非典反思
国家、社群和公民意识
209

后记
225

陈思和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陈思和

演讲人简介: 陈思和, 1954 年生于上海,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上海文学》主编。主要著作有《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鸡鸣风雨》、《笔走龙蛇》、《陈思和自选集》, 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

演讲时间: 2002 年 12 月 3 日晚

演讲地点: 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 102 室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代，我将它命名为“无名”，与它相对的概念则是“共名”。共名时代的文学，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统一的宏大主题，而无名时代则找不到这样的主题，所以，我无法用一种单一的语言来全面概括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不过，我们倒可以通过一些文学现象，来梳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某些信息，并发现它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中，一些重要的作家，像王安忆、张炜等，与以前的创作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他们越来越靠近现实了。比如王安忆，她在1990年代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是《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纪实与虚构》是叙述她自己的家族史的，和现实关系不大。作品出版以后，王安忆在杭州签名售书时，有位读者就对她说：“你别写了，你再写下去，你这个人就变成一张纸了！”因为她整天耗在这张纸上，建筑着各种各样的世界，最后把自己的所有感情都通过一张纸来告诉读者，现实世界对她来说，已经慢慢地淡漠了，远离了，所以这位读者说王安忆快变成纸了。王安忆对此触动很大，她的风格从此便有了缓慢的转变。到了1990年代的后半期，她就创作了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就是现在很有名的《长恨歌》。大家知道，《长恨歌》也不是一部面对现实的作品，虽然也涉及改革开放以后，但是整体而言，这个故事依然是王安忆靠想像、虚构来编织的。关于这部作品，以前我讲过很多，今天就不再重复。我要说的是，在新世纪之初，王安忆一连发表了两部小长篇，一部是《富萍》，还有一部是《上种红菱下种藕》。这两部作品，她选择的主题和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不仅与《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不一样，而且还从一个方面走向了另一个方面，走向了以往自己的对立面。《上种红菱下种藕》写的是一个小镇，我估计大概就是乌镇这一带，王安忆对发生在改革开放中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做了津津有味的描述，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亲切感。

与此相应的是，山东作家张炜的创作也发生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变化。张炜原来是一个对农村、土地、故乡、田原怀着深切感情的作家，他的小说写葡萄园、故乡的土地，他希望永远保持一个美丽肥沃的山东平原的景象，而对这块土地上所有发生的事件，比如他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经济开发，如建造高尔夫球场、别墅等等，都感到无比愤怒，认为这种经济开发把美丽的田原破坏了。他太喜欢农村，太喜欢那种传统的田原生活了，而对于经济

发展当中的有些现象一直是持坚决批判态度的。可是到了新世纪以后,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尽管通过标题大家可以想像,这依然是一部对田原充满着怀念的小说,然而却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小说写的是一位画家,经济改革大潮来了之后,就下海做生意去了,可是搞得焦头烂额,负债累累,最后他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他少年时代画的画,上面画满了蜀葵。当然可以说这里包含了一种对故乡和以前那种生活的怀念,但是张炜在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作者对于画家不再是谴责,而是充满了同情。

像这样的创作现象,我觉得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个别作家的创作风格的改变,有一系列的作家都发生了这种变化,甚至包括著名的先锋派作家苏童。苏童去年写了一部长篇《蛇为什么会飞》,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部小说也是面对下层社会,写了一群生活在底层的,如旅馆的服务员、下岗工人、还有些二流子等等,他们在一起乱哄哄的生活,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重要迹象是,山东作家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以今天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民工为题材,写了他们到都市以后一系列悲惨的遭遇。就今天的当代文学而言,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景象?为什么在新世纪之初,文学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

面对这一系列现象,文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到底如何来看待今天的文学?这个问题,在文学理论上、文学观念上,涉及我们如何看待整个1990年代的文学,同时又涉及文学艺术应该如何来表现生活、如何反映生活。

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近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文学,其中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变化。在1980年代的时候,一直强调文学要贴近现实,不仅是反映现实,而且要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推动整个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去贴近生活、文学如何去描写现实世界?文学的反映生活,究竟是千篇一律的,还是充满个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的绝大多数现象,都是10个人用一种方法描写生活。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这个作家与那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尽管可以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每个作家在描述生活时的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作家在创作这个生活故事的时候,当然有自己的经历,但他在描述这个经历的时候,有一个给定的视角,这个视角往往是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不能越雷池一步。比如,

“反思文学”有一个特点，故事背景都是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主人公一般是一个热爱新社会的纯洁青年，因为反右运动中响应号召给组织提了意见，便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去。而这位纯洁青年去农村就碰到非常好的农民，比如房东老大娘之类，还有个农村姑娘爱上了他。总之他在人民当中得到了温暖，于是思想得到了升华，过了 20 年右派问题得到了平反，他就要表达这样一种对人民的感恩之情……大致都是这样的模式。这样的作品，你读一篇时也许感觉非常好，可是看多了以后就会觉得，基本的模式还是一样的。

如果超出了这个基本的模式，就无法发表。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在一家著名的文学杂志社实习，帮他们处理来稿。我把读到的一部我认为比较好的中篇作品，推荐给编辑部，结果还是被他们否定了。我当时很想不通，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很好，现在忘了标题，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被错划的富农的妻子，小说写村干部在土改时迫害她，把她搞得家破人亡，然后她一次又一次地上访。上访到 1957 年，几个大学生了解了她的情况，就把她的事情推荐到报纸上讨论，说她本来不是富农，却被错划为富农，造成很多悲惨的故事。于是上级领导也都关心，要把她的错划问题改正，可是没过几天反右运动开始了，那几个发表文章的大学生全被打成右派，她到最后非但不能平反，反而也成了右派。农村本来没有右派的，她却戴了个右派帽子。然后她继续不断上访，到最后是个光明尾巴，“文革”以后给她平反了。我想可能当时作者的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故事，但这部作品，当时这家杂志却不敢发表。开始他们对我说这部小说写得太粗糙了，达不到发表要求，但后来编辑告诉我，其实不是因为粗糙，而是因为他写的不是 1957 年反右的问题，而是土改的问题，中央没有说过土改存在什么问题，所以这部小说是无法发表的。到这时我才知道，思想解放原来都是经过允许的，允许它解放到什么程度它就解放到什么程度，没有允许的区域就不能解放。一直到 1986 年末，张炜才发表了长篇小说《古船》，写的就是土改当中共产党的土改运动、国民党的还乡团、再加上农民自己的农会，这三方力量之间的互相斗争和残杀。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是对土改过程中出现的暴力现象的反思，公开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想，当时之所以给人震撼，除了这部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第一次这么深刻地触及了 1950 年代初期的土改，真实

地再现了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及其给人性带来的伤害。我于是就想起当年在杂志社看到的那部小说，它就是没有碰到《古船》那样的出版机会。《古船》出版以后，关于土改的禁区就打破了，后来很多作品都涉及这一禁区。

但是在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作家每写出一部好的作品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过去看到的土改只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都是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模式，只有张爱玲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土改的，那就是她的《秧歌》，不过这部小说在大陆是无法出版的。张炜写《古船》的时候，并没有前例，他是第一次对土改运动作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反思，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反思。作家能够走出这一步，用自己的独特眼光描绘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这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要说，1980年代的文学反映生活、贴近现实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文学反映生活的方式和视角是被规定的，规定作家必须按照某一个模式去反映生活，如果作家超越了这一个规定的模式，实际上就难以出版和发表。

现在回顾1980年代的文学，通常大家都会这样说：这个作品写得虽然不成熟、很粗糙，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这里所肯定的它的优点，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优点，而是它所承担的并非文学的功能，如政治宣传、道德教化等。今天的社会信息传播、新闻传媒都很发达，但1980年代时的社会发展还处于一个初级水平，那时很多问题，社会学不能解决，法律无法回答，新闻媒体更不能报道，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才能引起重视，得到解决。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是，虽然当时的《婚姻法》规定可以离婚，但那时离婚的人在社会上通常是受到歧视的，大家对离婚问题都很回避，现在当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正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开始，通过描写家庭的破裂，分析感情为什么会慢慢淡化，婚姻为什么会走向死路等等，当时的几位女作家，如谌容、张洁、张抗抗等都是写婚姻问题的名家。她们的这类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当时很多人原本都不知道可以离婚，是看了这些小说以后才知道的。由于这样的创作推动了社会的思想解放，间接地使情感、婚姻这样的一个个禁区被打开，使社会生活向更文明发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了解什么是情感、婚姻问题，过去从来没有普及过，没有启蒙过，正是通过文学作品才让人们真正了解了情感、婚姻是怎么一回事。领了结婚证当然是合法婚姻，但只有建立在

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合理的婚姻。我觉得，有时文学艺术会起到“社会教师”的作用，它会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类似的问题当时还有很多，但反过来说，文学本身的问题，没有人提。当时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在用可以引起轰动的问题来作为小说的主题，而真正的文学是什么却被忘记了。这种创作倾向，用社会或道德的主题来掩盖文学本身的问题，终于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觉得这样写下去不行。

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位非常好的作家，他的创作和当时几乎所有作家都不同，那就是汪曾祺。他写过很多中篇、短篇小说，几乎没有一篇是描写现实生活的。如《受戒》、《大淖纪事》等等，故事没有一个具体的年代，既可能是1930年代，也可能是1940年代，而他表现的环境，则总是他的故乡苏北高邮。汪曾祺所有的小说都围绕着高邮，描绘高邮的人情风土。高邮不是鱼米之乡，土产品似乎只有咸鸭蛋。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好像也是那个地方人，大概因为穷才会更了解强盗吧。但是，人穷到了一无所有以后，就变得非常自由了。汪曾祺用一种非常亲切的方式来描绘他的家乡的这些人物，比如他笔下的女人。他说我们家乡的女人个个很凶，一点都不怕人，没有羞羞答答的，该骂就骂，该说就说。表面上是说家乡的女人凶，实际上是在赞美家乡的女人，写得非常朴实。在生活于底层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身上，涌动着一股磅礴的青春魅力，不存在任何清规戒律，他在《受戒》里便写一个小和尚和村里的姑娘恋爱、结婚。和尚都可以结婚，这里就没有了规范，所谓的社会道德或封建禁锢等等都被打破，他以他们在底层的生存为本色塑造他们，写出了他们对生活自由的感受。

此外，汪曾祺是当代作家中比较注意文字本身美感的一个。中国文学是用汉字创作的，一首诗、一篇小说、一篇散文都是用汉字一笔一画写出来的，那么汉字本身它有没有力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追求的是大众文学，以宣传为目标，叙事仅仅作为写作的手段，由此形成一种追求声音效果的文学创作。比如抗战时期的朗诵诗就特别走红，还有快板诗、传单诗等等，都是这样。大多数的小说，都是作家在对读者讲一个故事，这种小说读起来语言非常流畅，主题非常鲜明，还要求有节奏感、有音乐性等等。巴金的小说就是这样，他的每句话都是简单句，“我”如何如何，读起来跳跃感很强，完全是在倾诉他的故事。但是，汪曾祺却与众不同。他的小说念起来不大好听，但反过来，他是写给你看的，他每个字都非常讲究，似乎都

有弦外之音,都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一种氛围。这样的作品往往读起来很不顺口,不顺口就必须停顿,每次停顿时你就会思考为什么要停顿,因为他的语言用的很特殊,这样你就会感觉到语言本身有一种回味,激起一种审美。这是一个涉及音本位和字本位的问题,我的同事、复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有过专门研究,他的论文《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来看。汪曾祺很早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中国文学很多都是说话的艺术,比如古代文学就有话本与拟话本,是说书人的底本,但《红楼梦》就不是说话的艺术,而是描写的艺术。也就是说,当一位作家不再求助于文学的说话功能,转而注重描写,强调文字本身的魅力时,文学就发生了一种变化。这种创作往往不是为大众的,因为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要被大众理解,那就干脆写通俗小说,讲故事给大众听。可是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却是一字一字地斟酌,把小说雕琢得尽可能的美丽,这样,他创作的初衷就不是考虑给大众阅读,而是首先给自己看,然后是给另外一些与他有着共同艺术修养的人看的。这就如同我们欣赏一首古体诗,站在讲台上朗诵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单从语音无法听懂,但是如果是几个朋友坐着欣赏,感觉就很不相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汪曾祺的文学表现手段标志着中国文学将出现分化:从社会化的文学转向了个人化的、审美化的文学。这种文学注定不能为大多数读者所拥有,尽管中文系的学生可能都知道汪曾祺,一些文学爱好者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可是在社会上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此后人们对文学的反思,这样的创作逐渐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社会化的文学和个人化的文学两条文学道路,但这两条文学道路在19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变化。1980年代主要都是社会化的文学,个人化的文学比较少,到1990年代以后,非常明显的现象是社会化的文学创作越来越淡化,而大量出现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先锋派作家的作品,都是一些个人化的、以描写为主而不是说话为主的文学作品。1990年代前期出现了所谓“新生代”的文学,比如南京的青年作家朱文、韩东,北京的女作家林白、陈染等,他们的创作已经完全和社会化的内容分离。他们主要表现的是内心世界,是作家面对世界的时候,内心所激起的一种反应。这样一个朝内转的过程,基本上统治了1990年代整整10年。

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朝内转的文学是否就一定与社会无关了